

# 王计兵：做一棵榕树，独木成林

年度诗歌

王计兵《低处飞行》

作家出版社2024年2月

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

致敬辞

这是王计兵为自己写的诗，也是为“外卖小哥”写的诗，它让世人看见：即使是在生活低处的飞行，也能插上让心灵自由翱翔的翅膀。他从一个“赶时间的人”，触碰到一群人的悲欢，既写实，又抒情。雨滴与汗水浇灌的诗行，在快递单的背面、餐箱的夹缝里，开出倔强的花。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之一，他的写作昭示：低处并非卑下，而是生命之树的土壤；根须越深，树冠越能迎风。

感言

终因普通而不凡

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外卖员，送外卖已经送了7年。我也是个文学爱好者，已经写了37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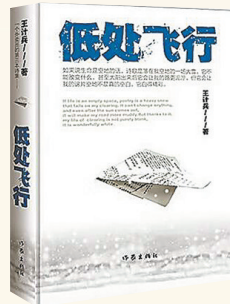
当我从一个外卖员写作“走出来”的时候，被标上一个标签——“外卖诗人”。有很多朋友问我怎么看待这个标签？我说，如果我低着头，肯定不是因为挂满果实，而是因为我背负着恩情。这两年，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的出现，其社会意义大于文学价值。我心想做点什么，于是我给外卖小哥写了一本书。

这两年，“新大众文艺”被提出来，它让我们普通写作者非常亢奋。这让我想起了草和草原的价值：草原之所以辽阔，是因为草团结一心，浩浩荡荡，我想我们也应如此。

这段时间来到广州，让我最感动的是一棵榕树，我形容它是一棵“会自己行走”的树。我想，如果让我做一棵树，我就做榕树，这是一种可以独木成林的树。如果让我做草，我就做草原上的一株草。我希望我们万众一心，终因普通而不凡。

王计兵

1969年11月出生，籍贯江苏徐州，现居江苏昆山。新大众文艺代表作家。已出版诗集《赶时间的人》《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》等五部。



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、专职副主席李宜航(左)与广州市荔湾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徐明曦(右)共同为王计兵(中)颁发奖杯、证书

“低处飞行”是一种生命态度

羊城晚报：如何理解“低处飞行”？“低处”如何“飞行”、能“飞”多高？

王计兵：我想表达的是一种生命的态度，生命是平等的，生活不是平等的。所以我写下，“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，低处飞行也是飞行。”这是我们对生命的一种状态。我们是成群起落的麻雀，我们是蝴蝶、是蜜蜂，我们或许没有能力飞上云霄，但是我们拥有翅膀，要让飞行变成我们的生命状态。

羊城晚报：在形容具体意象时，您经常“反着写”“动静倒转”。这种独特写法是自然形成的吗？

王计兵：写作有时候需要反向思维。比如刚才我看到一架架飞机经过，从视觉上看，它慢于车辆，也慢于骑电瓶车、骑自行车过去的人。但如果你提到飞机很“慢”，大家可能会很愕然，这时就需要用文字去组建、阐明你的观点。

当这种“反向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时，就能给读者带来一种意外，通过意外带来

阅读上的愉悦。

羊城晚报：能否认为这种“反向思维”已经成为了您的常规写法或个人风格？

王计兵：它是一种总结。随着写作的不断积累，你需要掌握一些技巧。大家有时候说我的写作是无技巧的，说实话我也是有技巧的，这是一种朴拙的表达方式。我不想作品里表现出精确性或技巧性，希望能写出大家读得懂的文字。

羊城晚报：会不会担心大家会看腻？

王计兵：如果有人持续关注我的话，他肯定会看腻，所以我不希望用一成不变的方式去写作。包括现在大家都对AI讳莫如深，仿佛写作者聊到AI写作就是羞耻的。我认为AI能给平民带来一场“文艺狂欢”，能给人们带来宽广的知识。

我想提醒大家，AI能够帮助你，但不能引导你甚至帮你写诗。据我目前的阅读经验，我能够甄别出大部分AI写的作品，它跟真人写的还是有明显区别。

“笑给自己看”

羊城晚报：您的家人在早期并不支持您写作，对吗？

王计兵：我从1988年开始写作，1992年发表作品。后来父亲烧掉我的稿件，禁止我写作。回过头来想，是我追求梦想的方式出现了问题。

当年我写作一度陷入到自己的困局里，我日以继夜地写，写到营养不良，写到昏厥。再加上我过度追求故事的真实性，为此得罪了村民。有个村民冲到我家里把我父亲打了一顿，因为我写到了他。

包括我的爱人，她跟我吃了太多的苦。我们在地板上睡了十几年，没有家、没有床。在这样的状态下，当她对你的写作表达出不开心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顾全大局。后来我把爱好藏起来，但一直坚守这份爱好。

羊城晚报：您为何如此痴迷于写作？动力何在？

王计兵：我最初被梦想所困，后来就是被爱好左右，而当我把梦想转化成爱好，反而会一身的轻松。我就喜欢这件事情，仅此而已。人不管在什么样的状态下，有一件自己内心喜欢的事情在默默坚守，它所带来的精神支撑力是很强的。

羊城晚报：您似乎有种特殊的写作习惯，不习惯在完好、洁白的纸上写作？

王计兵：我现在依然没有固定的草稿本，都是将香烟纸、香烟壳拆出来写字。我会在烟壳的白纸那一面写满字，然后才丢掉，这是一种生活习惯。

这可能也跟我的一部分天性有关，受我母亲的影响比较大。因为我母亲从小是孤儿，她教给我们的就是乐观。她说，“笑是笑给自己看”。这句话几乎成了我的座右铭。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笑一笑，没有过不去的。

别让“新大众文艺”的标签拉低文艺高度

羊城晚报：现在您的家人还会反对您写作吗？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态度上的转变？

王计兵：我在2019年拿过一次诗歌奖，我把这首诗拿给我爱人看，开玩笑说五行诗能“换”3000块钱。那一年我的运气很好，拿到了两笔奖金。我爱人发现写诗还能赚钱，她就说，想写诗就去写，但不要像作贼一样，也不要耽误家里的事情。

直到2022年我出版第一本诗集《赶时间的人》，拿到了几万块钱的稿费。这对我们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我将稿费换成现金往桌面上一摔，腰杆立刻直了。从那之后就完全变了，我想写就去写。现在，写作是我家人的第一等大事。

羊城晚报：作为新大众文艺写作者的典型代表人物，您如何看待“新大众文艺”？

王计兵：我认为现在是“新大众文艺”的黄金期，但不是高峰期。高峰期还没有到来，可能会在我们的下一代到来。

顶着“新大众文艺”标签走出来的人，包括我个人，要警惕一个现象——出道即高峰。我们一定要警惕，光芒散去后我们在做什么，要做什么、做好本真。接下来要更加勤奋，因为你接触的层面变广了，机会也变多了，要更努力地把你的能力和机会搭配起来。

不要让“新大众文艺”的标签拉低文艺的高度。文艺一定是有高度的，大众文学也一定是需要加工的。如果你本身不具备技巧，就不要去谈“无技巧”这个话题。“无技巧”是“有技巧”之后，经过淘汰、修炼后产生的。

# 梁衡：以记者之眼写“大事、大情、大理”

年度散文

梁衡《重阳》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

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实习生 李岑

访谈

致敬辞

梁衡的散文集《重阳》，既有对青春岁月的深情回忆，也有“踏遍青山写古树”的精彩华章。他的散文为美而写，为思想而写，始终关乎“大事、大情、大理”。他集记者的敏锐、作家的文笔、学者的积淀、官员的责任于一身，探访名山大川，捕捉身边风景，将自然风貌与历史事件勾连融通，涵养出深沉的人文关怀。近些年来，他倡导人文森林学理念，不忘“妙手著文章”的文学初心，践行“铁肩担道义”的文化自觉，在多元消费时代，为散文创作注入了一股如拂面清风的正能量。

感言

“自制秘方”成五彩文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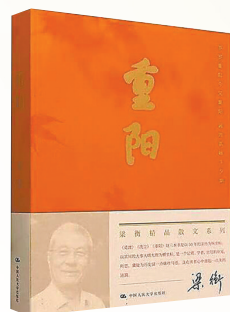
《重阳》这本书的内容跨度有半个多世纪，有我在边疆工作的回忆，有改革开放中的人和事，有退休后独创的“人文森林学”，用散文书写学术，书写“树梢上的中国”。这里浓缩着一个时代的影子，也反映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。

经历50多年的写作，我总结了一个公式，叫“一大二为三层五诀”。“一大”是指我提倡写“大事、大情、大理”，特别首选大题材书写。“二为”是指文章要为思想而写，为美而写。“三层”是指好文章应该有三个层次的美——形境、情境和理境。“五诀”是指文章的5个基本要素：“形、事、情、理、典”。“形”是外形描写，“事”指事件叙述，“情”是感情的抒发，“理”是事物内部哲理的揭示，“典”是典故。其中形、事为实、情、理为虚，典是作者的知识储备。虚实转换，交错使用，才成五彩文章。

这只是我的“自制秘方”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

梁衡

1946年5月出生，山西霍州人。著有散文集《觅渡》《洗尘》等。先后有《晋祠》《壶口瀑布》《觅渡，觅渡，渡何处》等数十篇文章入选大、中、小学教材。曾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、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。



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、专职副主席向欣(左)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、副社长、副总编辑胡泉(右)共同为梁衡(中)颁发奖杯、证书

要追求创造式写作、积累式阅读

羊城晚报：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阶段，出现了“当代散文三大家”——杨朔、刘白羽、秦牧。那时的散文和当下的散文有何不同？

梁衡：这三位作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很大。杨朔的文字很好，但过于政治化，不管写景、写人都要贴上政治标签，后来形成了写作定式。我在1982年最早对杨朔的散文模式提出反思。

刘白羽的散文气象很宏大，但有点像“宫殿”，很华丽但没法住人。秦牧的散文更接地气，我更喜欢。其实秦牧算是我的散文启蒙老师。小学时我攒的零花钱，买的第一本散文集就是秦牧的《艺海拾贝》。他写的《社稷坛抒情》一文我几乎能背下来。秦牧的散文耐读，因为它蕴含着深厚的思想性，这基于他对历史的理解。

当下的散文有两种倾向我认为要警惕。一种是篇幅很长，有点像报告文学甚至中篇小说，但在思想和审美上的高度

上还有欠缺，有时会掺杂虚构想象。散文和小说有个最大的区别，散文一定是真实的，这是我坚持的原则。另一种倾向是沉溺于自我陶醉的情绪，不关心现实，只关心自己的情趣，这种文字也很难突破平庸。

我提倡写“大事、大情、大理”，题材要大，蕴含国家民族情怀，还能揭示出历史规律或人性真理的文章，才可能在多年以后留得下来。

羊城晚报：“私人化写作”能不能留下好作品？

梁衡：写作分两种。一种是宣泄式写作，就像写日记，抒发情感，这无可厚非。另一种是创造式写作，它追求思想的深度与审美的境界，这显然属于更高的层次。

相应的，阅读也分两种，一种是消费性阅读，主要为轻松消遣。另一种是积累式阅读，能为人的精神注入养分，日后转化为写作积累。我认为要追求创造式的写作、积累式的阅读。

为文第一要激动

羊城晚报：您的散文写作涉及大量历史人物事件，写瞿秋白花了6年，写周恩来前后经过了20年。如何将大量文献档案融入写作之中？

梁衡：我在1998年写完《大无大有周恩来》，这篇文章我坚持了20年。我不是专业作家，没有签约的压力，文学是我业余的爱好，这反而更自由。我并不是想写出一篇名作，只是想替周总理把心里的那份压抑挑明了，替老百姓把敬仰表达出来，是对时代的一种回应。

我第一次接触“打倒四人帮”的资料是1976年，第二年在国家博物馆（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）举办了关于周恩来的展览，当时我还在山西工作，专门坐火车来看展。那些和周恩来有关的文物让我触动很大，比如他工作的台历翻在他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天，他临终时戴的手表停在他去世的那一刻，他的睡衣破旧得像纱网……我当即写下《一个伟大生命的价值》一文，大概2000字。

为文第一要激动。首先这个内容“激动”了我，我也想把“激动”传达给读者。

后来我到了新闻出版署工作，

有了接触更多资料的可能。当时调出的资料堆得比桌子还高，那些回忆文章大部分来自周恩来身边的人，如秘书、司机、警卫等。这些材料细节丰富，但缺少核心的提炼。我归纳出周恩来的“六个无”——死不留灰、生而无后、官而不显、党而不私、劳而无怨、去不留言的品格。

羊城晚报：退休后您开始转向写古树，这是什么契机？

梁衡：在我看来，记录历史有几种方式，一种是文字，比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。一种是文物、遗址，例如故宫、长城、金字塔，都能讲故事。还有一种就是古树，有的古树见证了几千年的历史。我写的人文古树，是有年头有故事有传奇，与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树，纵向看来是历史的里程碑，横向看是当地的地理坐标。

散文集《重阳》的书名就是取自《伤怀的重阳木》一文，写的是彭德怀1958年回乡调查，亲手救下一棵重阳木的故事。文章借这棵树，反思“大跃进”时期的教训，表达对彭德怀为民请命、刚正不阿的精神的缅怀。

不要被消费性的内容完全淹没

羊城晚报：您有过多种身份，记者、作家、新闻管理者等等，哪一种身份对您影响最大？

梁衡：我最基本的身份是记者，一个新闻人。我常说新闻是一个最好的平台，如果年轻人毕业先当4年记者，相当于再上一个大学，能够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。

记者首先培养了一个人的责任心，这让我在选题时自然倾向于关注时代、民族的大命题。记者还培养了人的独立思考能力，判断真伪、洞察本质。这让我不跟风、不盲从。

记者的天职是求真，作家的追求是审美和创造。比如面对社会事件，记者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事件能不能报道，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

响。他首先考虑的是社会责任。而作家的第一感觉是事情有没有故事性，更侧重于个人化的表达和创作。

当然作家也有优势，在新闻受到客观制约的领域，文学反而可以弥补新闻的不足，能以另一种方式抵达真实。

羊城晚报：您如何看待当下媒体的发展？

梁衡：我理解媒体的生存压力。但是，不要被消费性的内容完全淹没。可以就某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，做出一篇有分量的报道，集结力量干成一件大事。广东新闻界有调查报道、舆论监督的优良传统，能不能把它重新拾起来，这取决于你们有没有这份责任心和勇气。